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澳] 冯兆基(Edmund S.K.Fung) 著

郭太风 译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军事近代化 与中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56669

E295
2

DG94/30 88398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澳] 冯兆基(Edmund S.K.Fung)著

郭太风 译

军事近代化 与中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唐克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澳〕冯兆基 著

郭太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68,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1634-4/K 395

定价 12.75 元

英文版序言

尽管这部著作不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但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辛亥革命时期河北省革命运动的博士后研究期间，开始对晚清军队产生了兴趣。河北为这场革命中的新军作用提供了饶有趣味的研究素材。不过后来我觉得，为了更深刻更充分地理解最终导致清皇朝垮台的新军的作用，必须开阔视野，超出河北一省的界限和革命党人的活动看问题。从博士后论文中取出几篇文章发表后，我对1903年至1913年间的军事演化展开范围更加宽广的研究。

本著作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在格列菲斯大学完成的，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转借来的资料使我获益匪浅。我还花了些时间外出收集资料：1976年至1977年的夏季（南半球）在堪培拉，1977年7月在悉尼的米切尔图书馆，1977年至1978年的冬季（北半球）在伦敦公共档案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还有幸访问了台湾的国民党档案馆和东京的东洋文库。

本著作涉及的中文姓名和专用名词用中国的拼音系统处理。然而，为了方便起见，也有些例外。通商口岸和设有外国传教机构的城市遵循邮政惯例，使用韦氏拼音法，因而济南用 Tsinan，不用 Jinan；天津用 Tientsin，不用 Tianjin；广州为 Canton，而不是 Guangzhou；北京用 Peking 来代替 Beijing，台北用 Taipei（用于资料出处）来替代 TaiBei，蒙古用 Mongolia 替代 Menggu，而西藏则用 Tibet 替代了 Xizang。英语写作中人所共知的著名人物的姓

2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名,也照习惯用法保持原样。而不按北京话书写。因此,孙逸仙用 Sun Yat-sen,不用 Sunyixian。

这部著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一些人的鼓励、指导和支持,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良师益友王光武教授理应名列首位。他在我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予鼓励。他读了本著作的最后一稿,并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我还得感谢 C·P·菲茨杰拉德荣誉教授,陈志让教授以及欧内斯特·P·杨教授。他们对博士论文的评论,使我开阔了对新军研究的思路,从而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在格列菲斯大学,我的两位杰出的同事 C·P·麦克斯拉斯教授和 D·H·麦克米伦博士阅读了本著作的手稿,提出修改意见,还在文字上作了些润色加工。至于这部著作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当然由我本人负责。

本著作第九章曾发表于《远东史学论丛》第19期(1979年3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同意将这篇文章收入本著书,我对此表示感谢。

书中的照片都取自德国出版的一部当代影集《中国的革命》,经格列菲斯大学图书馆许可后采用。

我还受惠于格列菲斯大学的资助。如果没有这项资助,我将无法去堪培拉、悉尼和伦敦从事访问研究。我应该感谢詹尼弗·帕克斯夫人和埃姆·佩莱康诺斯女士,她们为我的手稿打字,工作极其认真仔细。此外,我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全体人员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的编辑工作,并在其他方面给予指点帮助。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德芳给我的精神支持。如若没有她的理解和鼓励,这部著作将无法完成。

冯光著

1978年11月于布列斯班

中文版前言

郭太风教授1990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访问研究期间，建议将我的著作《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直译《中国革命的军事因素》）译成中文，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深感荣幸。这部著作在国际上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但我不清楚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注意到了这部著作。令我欣慰的是，中译本有幸问世，使中国读者得以顺利地阅读。

郭太风教授尽心竭力地翻译这部著作，我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郭太风教授本人就是有造诣的军事史学者。他的译文准确、忠于原著。他学风严谨，文笔老练，使译著通顺流畅。在翻译过程中，他还发现英文版一些排印错漏，同我磋商后，逐一纠正。如此翻译，确非易事。英文本中若干人名和地名无法确切地译成中文，这是郭太风教授碰到的一个难题，然而责任不在于他。我研究时引用了部分英国和美国的资料，其中有些专用名词没有标明中文。由于少数几个人名和地名鲜为人知，因而无法查实，只能采用音译。

沈渭滨教授撰文介绍，使中译本锦上添花。沈教授是杰出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里名扬海外。他对我的著作感兴趣，并不吝赐文，我谨表深切的谢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译著。从商业角度看，出版学术著作不能盈利，中国与其他国家都存在问题。我希望出版者最终会发觉，出版这部著作是值得的。

冯兆基

1991年7月于布列斯班

序 言

沈渭滨

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终于在我国出版了中文本，这是值得高兴的。

作者冯兆基博士，澳大利亚格列菲斯大学亚洲国际研究院院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这部著作，是他早年在澳洲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开始酝酿写作的，1980年由澳洲国立大学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英文本。欧、美、澳学者纷纷发表书评，认为此书在中国近代军事史和辛亥革命研究中，“填补了相当大的历史空白”；并把它和美国学者拉尔夫·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并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军事史的两大力作。

我读了此书的中文译稿后，觉得西方评论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出版于1955年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军事力量的权威性作品，那么冯兆基博士的这部著作，堪称80年代西方研究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的代表作。

二次大战前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在观察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大多以“冲击—反应”作为分析模式，力图证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但是，随着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的失败和不发达国家的迅速崛起，新一代的西方学者

经过痛苦而又冷静的反思之后，纷纷转向从这些国家内部去寻找自身成长起来的积极因素，分析框架为之一变。冯兆基博士的这部著作，恰是两种分析模式交替时期的研究成果。就其主要内容看，也是这种新趋向的一个重要收获。

他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军事改革和社会反响，第二部分论述军心动摇和兵变过程，第三部分则探讨辛亥革命及其后果。三个部分以次递进又互为依存，完整地构成了对清末新军的兴衰过程及其与辛亥革命、民初政局关系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的主要特色就在于作者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和叙议结合的方法，从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寻求中国军事改革的必然性；从传统的文化结构和知识阶层对军事改革的共识来解释新式陆军的发展；通过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工作的分类比较，士兵成份构成的分析，士兵传统性冤苦的描述，自然灾害对新军心态的影响，以及清皇朝财政困难、管理不善引起官兵的怨愤等，说明新军对朝廷离心倾向普遍增长，从军事角度论证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分析新军起义对立宪派及地方士绅背叛清皇朝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都督擅权和军阀割据论证维护“以文治武”传统的必要等。这些都是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中忽视或开掘不深的方面，显出了作者向中国社会深层求索中所达到的新水平。

作者视野开拓，论证缜密，在分析中时时闪出思辨的火花，发人深省。例如作者在第四章《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中，把中国近代尚武主义的兴起和军国民教育的鼓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和好战尚武的两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说明新式知识分子颂扬尚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军事统治或构筑军国主义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在促进国防近代化的同时，扭转民众鄙视军人的陈旧观念和和平主义的心理定势。作者指出，一支充满新生活力的军队，不仅是国防的工具，而且将成为新道德的象征，带动尚武

的民风。作者的这种见解，对辛亥革命准备阶段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弃文就武的活动，确实是一种独辟蹊径的解释。

作者分析新军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时，认为革命策反活动只是造成新军动摇的因素之一。军事近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政治性经历，有助于军人形成近代化世界观，使他们认识到清皇朝积弊已深，国家处在危亡生存的十字路口，这就促使新军滋长起近代的国家民族意识。清政府多方扶植这种意识，力图把它引向排外。“不过，民族主义是双刃利剑，当它被用来反击外来侵略时，也砍向了满清统治者。”把民族主义比喻为双刃利剑，来说明军心动摇对朝廷的潜在威胁，既生动，又令人生发出历史联想和感慨。

作者认为新军的反戈一击，不但摧毁了一个旧政权，而且冲垮了中国“以文制武”的传统统治模式。在民国初年政治不稳的年代里，军方不但倾心于获取权力，而且在政治角逐中比文官集团准备得更充分。作者指出：传统模式被摧毁，造成民初都督擅权乃至后来的军阀割据，民众遂失去政治方向和心里定势。这个观点不仅对人们思考辛亥以后军阀势力的形成有启迪意义，而且为理解当前某些不发达国家中军方势力的增长开创了一条新思路。

我不敢说包括上述见解在内的本书主要观点中国学者都会同意。但可以肯定，作者所取的分析框架和力图从社会结构、阶层集团、政治机制、思想文化，价值判断，乃至社会生活状况、自然灾害影响等方面解释历史，这种立体的研究方式，大多数中国学者是会感兴趣的。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布洛赫所说：历史学家要有提出新思路的创新精神，历史著作只有闪现出思辨和史识的光彩，才有久远的价值。

冯兆基博士不仅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也有不少著述。1985年在美国出版了他与David Pong教授合编的《理想与现实》一书，收入了十

4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多篇论述中国近代社会及政治变迁的新作。同年，又与格列菲斯大学 Coln mackeras 教授合著《从疑惧到友好交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演变(1966—1982)》，由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他致力于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已完成了题为《帝国的外交退却—不列颠的华南政策(1924—1931)》一书。由此可知他是一位勤奋著述的学者。

我与冯兆基博士素不相识，只是因为专业的需要，才多次希望郭太风能把这部著作译成中文，设法出版。太风本人对中国近代军事史作过长期的研究，他发表的有关八旗、绿营俸饷制度的论文和关于清皇朝解协饷的研究，至今仍为军事史学者所重视。由他承担翻译此书的任务，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中英文表达理解等方面应不成问题。他不辞辛劳，翻译经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项有益的工作，并得到了原著作者冯博士的赞赏，称其译文正确，忠于原著，文笔老练，通顺畅达。我作为他的老师，也深感欣慰。

冯兆基博士的这部成名作，经过13年之后才被介绍到中国来，实在是太晚了一点。但是，它能以中文版与中国同行见面，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相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中国历史上新的一轮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双向流播热潮必将很快到来。地球变小，距离缩短，东西方学人都能潇洒走一回了。

1993年9月18日序于复旦大学文科楼

DG94/30

献给穗芳和育君

To Lucia and Eugene

目 录

英文版序言	
中文版前言	
序 言	沈渭滨

导 论	(1)
-----	-----

第一部分 陆军改革与社会反响

第一章 新军的形成	(16)
第二章 管理机制改革与军事财政	(47)
第三章 军事教育与民族主义	(79)
第四章 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	(110)

第二部分 军心动摇与兵变

第五章 湖北新军的革命运动	(144)
第六章 大江南北的其他军队	(182)
第七章 华南新军与北洋军	(212)

第三部分 革命及其后果

第八章 1911—1912年的革命	(244)
第九章 1912—1913年的陆军状况	(282)

第十章 辛亥革命引起的思辨	(310)
---------------------	-------

附录一 1906 年清政府筹建 36 镇新军及 摊派给各省额数	(319)
--	-------

附录二 辛亥革命爆发时新军分布状况	(320)
-------------------------	-------

注释中的缩写	(322)
--------------	-------

参考书目	(323)
------------	-------

译后记	(349)
-----------	-------

表 格 目 录

表一	一镇兵力·····	26
表二	1905年和1906年各省承担军饷情况·····	68
表三	1911年主要省区的军费预算·····	72
表四	1909年11月实施的文武官职对照表 ·····	111
表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部队 ·····	255
表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外的部队 ·····	257
表七	1911年10月至12月各省的革命 ·····	261
表八	中国民军编制一览表 ·····	287
	——军队各级单位新旧名称对照	
表九	中国民军编制一览表 ·····	288
	——各级军衔新旧名称对照	
表十	1913年划分军区计划 ·····	298
表十一	1915年划分军区计划 ·····	299

导 论

中国所有传统机制中，或许没有什么比军事组织更受西方鄙视的。“质量差到不足以挂齿”，那些对中国了解不深的外国人往往用这类话来论定中国陆军。19世纪，这个封建皇朝与外国进行一系列战争的结局，似乎证实了这一结论。难怪，1903年清政府宣布将按近代方式重建中国陆军时，外国观察家们自然十分怀疑中国人最终整治好军事机器的能力。

中国虽然有厌恶尚武主义的传统，但一直拥有组建一支优良军队的自然材料。一般说来，中国人是天生的宿命论者，顺从而很少有所需求。他们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显示出忍耐力和忠诚性，这是战斗人员最难能可贵的素质。中国士兵只依靠极少的给养就能维持生存，并进行长途征战，必要时即使被迫露宿也毫无怨愤。他们可以忍受有损于健康的环境，对一些曾摧毁许多西方军队的常见疾病似乎有免疫力。虽然他们比较适应于消极防御，不具备日本士兵勇狠敢斗的本性，但一旦有优秀的领导和称职的军官，他们会发动令人生畏的攻势。

新建陆军由遍布全国的许多镇(师)组成，被看作有别于各类地方部队的一支国家军队。最早编练成的北方六镇，通常称为北洋军，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大。在南方，陆军这个词似乎不很常用，那里新组建的镇常称为新军。为了避免概念混乱，本书无论在什么场合提到“新军”，都表示新式陆军的各支部队。

编练新军计划具有对外和对内双重目的，即抵御外来的侵略

和扩张,平息国内的革命挑战和集团内部的冲突,从而维护国家利益。这是清廷整体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强化清帝国地位,以对付外来侵略者和国内反叛者。与民政管理改革相仿,新军显示出它的功绩,也暴露出不足之处。尚武精神坚实地增长,军人地位得到稳步提高。军队士气随之高涨,因而更具有团结精神。另一方面,军官们还远远不能胜任工作,训练和武器装备缺乏统一性,军事运输和通讯设施不完备到可悲可叹的地步,腐败现象仍然猖狂蔓延。总而言之,尽管新军自从创建以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用西方或日本的标准来衡量,新军离近代化还有一大段差距。然而,新军正在朝近代化方向前进,因此,可以把它看成一支近代化过程中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军事历史上正在发生第一次令人瞩目的变化。

军事改革显然影响了中国人对军人的看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向来墨守成规,鄙视当兵打仗的人,而且他们在19世纪末是否不再抱有偏见,仍然是很成问题的。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对士兵的鄙视减少了些,许多有文化的人确实选择了军事职业。而且,新一代的中国学人士子认识到,为了救亡图存,中国需要一支强大的近代化军队,中国人需要改变对尚武价值的心理定势。作为建立强大而有尊严的中国的一条途径,振武主义事业得到知识分子和清政府的支持。

1911年,当清皇朝无法有效地驾驭新军并用它去抵御革命冲击时,就走向了灾难。就象清政府深切认识到的那样,新军是不满现状的。新军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与世隔绝或自我封闭的。与此相反,从军人的社会背景到激动人心的政治潮流,都成为外界影响渗透进新军内部。换种说法,军人对引发革命的各种力量没有抵御能力,国家的形势使知识界精英、乡村民众和城市贫民离心离德,也使军人心怀异志。确实,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前,军

队早已受到外来思想、国内势力、传统不满以及革命宣传的侵扰颠覆。革命刚刚爆发,南方省份的大批新军马上宣布支持共和事业。北洋军队虽然在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制,但也有所不满不忠,这就对清政府的毁灭起了作用。

本书集中探讨新军以及它对清皇朝最终垮台所起的作用。第一部分论述军事改革和社会反响,第二部分论述军心动摇和兵变的过程,第三部分则探讨辛亥革命及其后果。20世纪初新的军事改革运动当然可以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为了节省篇幅,1903年以前的军事沿革不作详尽论述。同样,对正在遣散过程中的各省旧式军队也不多展开。本书集中论述1903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的理由是,1903年12月练兵处设立后才开始创建新军,而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于1912年,但直到1913年才处在新总统牢固的控制下。然而,对所谓的“二次革命”着墨不多,仅限于刻划跟军队态度有关的内容。对民国初期整顿军备也不逐一展开,以免这本书变得冗长庞大。

要论述辛亥革命的军事因素,首先必须考察中国军队和军事机构所发生的整体性变革,无论改革成功与否都要论及。这在前3章完成。然后,我们将进而研究新军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社会各界在财政、道义和思想方面对新军的支持,动用新军来维护国内秩序和平息动乱,以及新军在增强或削弱不同团体的社会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本书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问题都阐述得淋漓尽致,只能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讨论。这种探讨以第四章为主,并散见于其他章节中。

本书第二和第三部分并不试图研究辛亥革命,有关这场革命运动的著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了。这两部分的重点放在迄今被忽略的领域,即新军不满现状以及它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对这场革命早期研究的倾向是,集中论述同盟会运动以及孙中山、黄兴和其他